



· 大学教师通识教育读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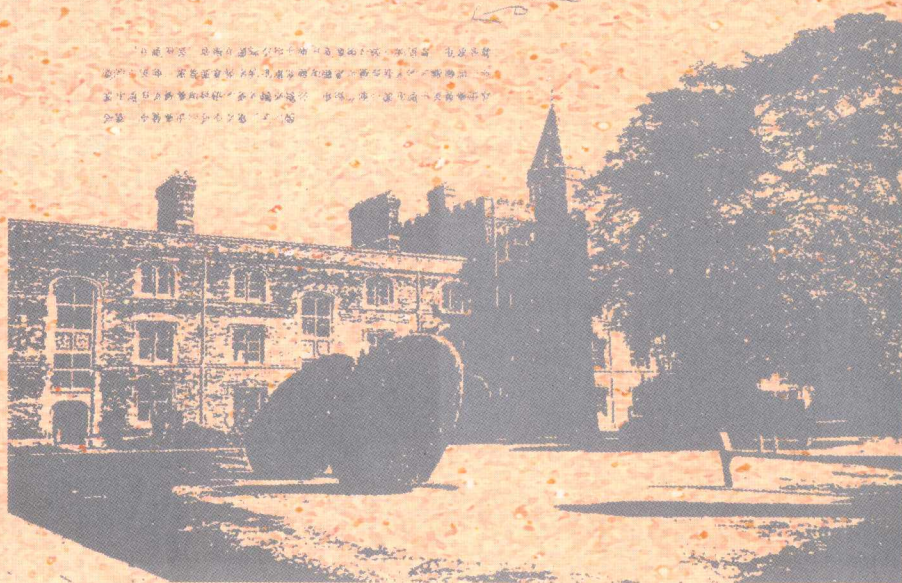
THE CALLING OF EDUCATION

The Academic Ethic and Other Essays on Higher Education

教师的道与德

[美] 爱德华·希尔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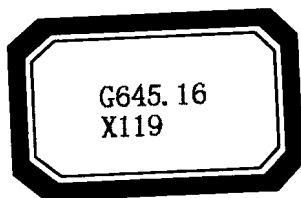
“师德建设”是高等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书从学术伦理、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学术自由、学术责任、学术诚信、学术创新、学术合作、学术竞争、学术评价、学术监督、学术问责等方面，深入探讨了教师的道与德问题。本书是教师通识教育的必读书目，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大学教师通识教育读本 ·



教师的道与德

[美] 爱德华·希尔斯 著

徐 弢 李思凡 姚 丹 译

G645.16
X119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66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师的道与德/(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徐弢,李思凡,姚丹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大学教师通识教育读本)

ISBN 978-7-301-16029-9

I. 教… II. ①爱…②徐…③李…④姚… III.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
IV. G64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0761 号

The Calling of Education: The Academic Ethic and Other Essays on Higher Education

By Edward Shils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Copyright © 1997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书 名: 教师的道与德

著作责任者: [美]爱德华·希尔斯 著 徐 弢 李思凡 姚 丹 译

丛 书 策 划: 周雁翎

丛 书 主 持: 周志刚

责 任 编 辑: 刘 军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6029-9/G·2708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 子 邮 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5 印张 232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大学是爱德华·希尔斯的领域、背景和根基,是他怀有最美好和最强烈的激情的地方。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热爱所有的大学,尤其是芝加哥大学和剑桥大学,而且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开始为大学的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尽管他思考过很多东西,但是高等教育从未远离他的学术视野。事实上,也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为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大学里度过的,而且他曾经在芝加哥任教达六十多年之久。

爱德华·希尔斯认为,大学是一个拥有巨大的特权的地方,而且那些能够在其中生活的男人和女人本身就是拥有巨大的特权的人。在大学里,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献身于书籍、科学、绘画、文献、语言研究、精神性的东西——这些高尚的东西让他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疯狂压迫,并无须过分地关注谋生的事情。对于任何精通某种真正技能的人物,他都非常尊重;在他看来,经营好一家商店也是一项有用的事业。但是,如果他必须为某个人指明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那么我想他所指定的将是大学里的学术生活。

由于爱德华·希尔斯如此热爱大学,所以他非常讨厌那些最终将损害到大学的攻击,更别说诽谤了。那些曾经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学生骚乱时代的芝加哥大学里生活过的人们介绍说,当时为爱德华·利瓦伊校长担任首席顾问的爱德华·希尔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回顾那个时代的历史,但是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芝加哥大学相对平稳地度过了那个时代,而没有像伯克利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以及几乎其他所有的美国主要高校一样,被那些事件搞得四分五裂。因为爱德华·希尔斯知道危险是什么,因为他通过长期的研究而认识到了大学在现代社会里的微妙地位,所以他能够提出明确的建议,而他提出的最终建议就是:要记住大学为什么重要,是什么使大学重要,以及为什么不能以暧昧的态度对待那些只考虑到其他的各种好处,而唯独没有考虑到大学的好处的学生。大学是爱德华·希尔斯最了解和最尊敬的机构。

爱德华·希尔斯对大学的认识可以被比喻为一个伟大的交响乐指挥家对其管弦乐队的认识。他知道每件乐器和每个乐器组的价值,而且不仅知道它们各自的功能,也知道它们在被适当地组合在一起时的功能。早在 1970 年,

希尔斯教授就在他为芝加哥大学创作的“大学教师的聘任标准”中阐明：如果这所大学想完成人们期望它完成的任务，它就需要在自己的各个部门和功能之间保持平衡。“一所大学的教师队伍不仅仅是一大群作为个人的科学家和学者，”他写道，“它必须拥有一种集体生活，一种通过研究、教学以及科学家和学者之间的对话而营造出来的氛围，这将促进和保证师生们的工作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准。”

出色的洞察力是爱德华·希尔斯的众多才能之一。他的洞察力来自于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冷静的常识。他从来不会忘记，为什么在一所像大学这样复杂的机构里，容易的事情也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偏差。在大学里，标准在一个地方可以被盗用，但这种盗用肯定会在另一个地方被发觉。我仍然记得，当爱德华·希尔斯认为芝加哥大学里的某些系进行了错误的聘任时，他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在局外人看来，这些聘任似乎并不是至关重要的。而在他看来，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对于一位自命不凡的、只会追求时髦的或者冥顽不化的教师的聘任都是一种降低水准的方式。他写道：“聘任一位平庸的求职者将会使我们更难在日后聘任一位杰出的求职者，并且使我们更难把出色的学生引进这所大学。”

希尔斯教授写过一本以传统为主题的优秀著作，他对于传统在大学里的角色有着最明晰的看法。记得有一次，我曾经向他请教他对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看法。他并不怀疑这所研究院里的大多数成员的学术声望都使他们有资格待在那里，但令他感到遗憾的是，这样的研究院会让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失去影响学生的渠道，因为学生肯定要住在大学里面。在他看来，这是在教师向学生传播知识的链条上出现的一次不幸的断裂。

但更糟糕的是，大学的管理阶层缺乏智识上的勇气，而且他发现，当大学校长不再是教育的领导者，而是日益成为主要从事资金募集和公关活动的人士时，这种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与缺乏智识上的勇气相比，更糟糕的是，大学的管理人员和教师都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在兰德尔·贾雷尔的小说《一所大学的图画》里，有一个人曾经把书中的一位人物、一位大学校长称为伪君子，但是作者反驳说，这并非一个准确的描述，因为那位校长还没有达到道德发展的阶段，从而不配得到如此称呼——毕竟，一位被称为伪君子的人还需要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因此，在当代大学里，有很多管理人员和教师对于学术自由的内容、教师的职责、大学的社会使命和地位等都缺乏最起码的认识。爱

*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at Princeton) 成立于 1930 年，它并非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供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做最纯粹的尖端研究，并且无须承担任何教学任务或者来自科研资金和赞助商的压力的研究机构。——译者注

德华·希尔斯则深深地了解这些东西——他了解所有的问题,而且他从未忘记正确的答案。

我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爱德华·希尔斯进行了最持之以恒的研究并且通过缜密的理解过滤了他的个人经验,所以他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这些东西。本书中的评论提供了希尔斯教授对于那些可以称之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的东西的核心认识和智慧。同时,它也为所有关注当代高等教育的命运的人们提供了一本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的著作。

约瑟夫·爱泼斯坦

导 言

爱德华·希尔斯的《学术道德》是“大学的未来国际研究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①的集体研究成果。它最初发表在1982年的《密涅瓦》杂志第20卷上,这份探讨科学、学习和策略的杂志是希尔斯于1962年创办的,而且直到他于1995年1月23日以84岁高龄去世为止,他一直在不辞劳苦、兢兢业业地担任该杂志的编辑。自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首次出版《学术道德》以来,该书的重要性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认可。如今,它将与爱德华·希尔斯的另外几篇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文章一起再版。

本书为了强调“学术道德”的重要性而在其后附加了五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更加详尽地论述了它所涉及的某个主题。这些文章是按照两个标准挑选出来的:首先,它们都是爱德华·希尔斯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最优秀的代表作,并且都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发表的;其次,它们都未曾出现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以前出版的希尔斯三卷本论文集中。^② 这些文章更加详尽地论述了当代高等教育方面的问题、疑惑和困难。

《学术道德》的目的是要阐明——并且由此重申——大学教师、研究人员和学者的道德责任。这些责任产生于对真理的发现和传播,以及与这种发现和传播密不可分的研究中的诚实和自由。在《学术道德》里,爱德华·希尔斯公布了一系列指导性原则来规定大学教师在教学和研究中的知识管理权以及大学教师在维系学术生活的大学内部管理中的角色及其对校外生活的参与。

按照希尔斯的观点,大学教师的特殊责任包含着研究和教学两个方面。为了强调研究与教学在大学教师的责任中的统一性,希尔斯重申了威廉·冯·洪堡关于大学的使命的设想。在这么做的同时,他也充分地意识到了大学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所出现的全新的情况和要求,其中包括大众型“研究型大学”的综合形象。虽然与洪堡的设想相比,希尔斯对于大学教师的相关责

① 关于这个研究团队的历史,参阅爱德华·希尔斯的“学术道德”(The Academic Ethic)一文的介绍,该文发表于 *Minerva* XX/1—2 (Spring—Summer 1982): 105—106。

②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 in Macro-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以及与“学术道德”的许多主题密切相关的论文集 *The Calling of Sociology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Pursuit of Lear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任的看法是更加悲观的——简单地说,他担心波拿巴的专家统治论观点,即把大学看成是一种致力于实用性工作的、为国家服务的机构的观点会占据上风^①——但是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即把发现基本真理和传播它们看成是大学教师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相互统一的责任。在本书所收录的“当代社会的大学理念”一文中,这种反复强调教学和研究的必然统一性的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阐明研究和教学这两个基本责任的同时,《学术道德》也理所当然地论述了大学教师对于他们自己所在的学科和学校责任,以及他们对于周边的社区的责任。其中,聘任教师就是他们的最具实践性的责任之一。通过聘任教师,大学教师对于他们自己的学科、学生和学校的义务得到了具体的表现,即他们不仅要遵循关于教学与研究成果的标准,还要遵循他们作为学术团体的成员的规范。因为教师聘任的标准会直接影响一所大学的质量,所以我们决定在本书中收录希尔斯的“大学教师的聘任标准”一文。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芝加哥大学高级职称聘任委员会的一份官方报告,其内容是对大学教师的聘任标准的阐释。该委员会的负责人爱德华·希尔斯是这份报告的撰写者。希尔斯始终坚持关于教学与研究成果的标准,而没有让它们屈从于其他标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坚决反对那些与平权行动*和“观点多元化”有关的标准。关于这些问题的长期争论是本书收录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

关于终身教职是否是保证大学教师充分履行其职责的必要条件,人们一直在不断提出疑问,尤其是在最近的英国。实行终身教职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于,它是学术自由的必然要求。因为关于终身教职和学术自由的争论仍然在继续,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还需要学术自由吗”这篇文章纳入本书之中。^②

希尔斯非常清楚,无论是大学教师与大学之间的关系,还是他们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在最近40年来变得日益复杂了。^③ 这些关系是《学术道

① 参阅 Edward Shils, "The Service of Societ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inerva* XXX/2 (Summer 1992): 242—268。

* 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是一项根据肯尼迪总统1961年签署的第10925号总统令而制定的行动计划,该计划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和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民族和女性。其目的是弥补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计划在美国社会和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很多美国人认为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所规定的人人平等的原则。迫于压力,目前大多数的州已经取消了该计划。——译者注

② 亦请参阅 Edward Shils, "Academic Freedom and Permanent Tenure," *Minerva* XXXIII/1 (Spring 1995): 5—17。

③ 参阅 Edward Shils, "The Service of Societ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inerva* XXX/2 (Summer 1992): 242—268。

德》所关注的主题之一,但是它也考虑到了大型的、官僚化的、政治性越来越强的大学的存在给学术道德带来的各种威胁。^①当希尔斯在1979年被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遴选为第八届杰斐逊讲席的主持者时,他所选择的主题便是美国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希尔斯教授一连发表了三篇演讲——第一篇在1979年4月9日发表于华盛顿特区;第二篇在1979年4月10日发表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第三篇在1979年4月17日发表于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这几篇演讲的主题分别是:政府对于大学的权力以及这些权力的限度;大学的正当权力;关于大学的权利和义务的宣言。尽管它们在内容上有少量的重复,但我们还是决定把它们统统收入本书之中,因为总的来看,它们的影响力和重要性都丝毫不亚于《学术道德》。

在主持杰斐逊讲席的十年之后,希尔斯又在“现代大学与民主自由”(本书的最后一篇评论)里回顾了他在《学术道德》和杰斐逊演讲中提到的许多问题。不过在这篇文章里,他是通过不同的方法来探讨这些问题的,即把大学放在自由民主、自由民主的制度安排、各种偶尔发生冲突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大背景中来加以分析。

爱德华·希尔斯是一位如此多产的作者,以至于他的任何一部文集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并适当地扩充两倍以上;他所写作的关于学术道德、追求学问、高等教育问题——这些都是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苦苦思索的主题——等方面的文章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本书的编辑者希望书中收录的这些文章可以鼓励读者去寻求希尔斯教授的其他著作——不仅仅是那些关于教育方面的著作。在这样做的时候,读者将会发现:爱德华·希尔斯在他所论述的各个主题上都是一位具有启迪性的思想家。

斯蒂夫·格罗斯比

^① 亦请参阅 Edward Shils, "The Academic Ethos Under Strain," *Minerva* XIII/1 (Spring 1975): 1—37。

目 录

序言·····	(1)
导言·····	(4)
学术道德·····	(1)
大学教师的聘任标准·····	(94)
我们还需要学术自由吗? ·····	(112)
政府、社会、大学:彼此的权利和义务 ·····	(132)
当代社会的大学理念·····	(177)
现代大学与自由民主制·····	(190)
译名对照表·····	(221)

内在的责任

大学的任务

大学拥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有条不紊地发现并且传授那些关于严肃的和重要的事物的真理。这项任务的一部分就是要增强学生的理解力,并且训练他们以批判的态度和方法去评价和检验他们的信念,从而使他们所信仰的东西能够尽可能地远离谬误。发现和传授真理是大学教师的特殊职责,正如照顾病人的健康是医务人员的特殊职责,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则是律师的特殊职责一样。传授特殊真理的先决条件是要普遍地承认那些适用于任何一个特殊对象的或者任何一类对象的真理的价值。真理即便在没有被诉诸使用的情况下也具有其自身的价值,这种信念是大学的各项工作的前提。大学教师首先要相信真理比谬误更好,正如医务人员首先要承认健康比疾病更好,法律工作者首先要相信保障合法的权利比受制于独裁的权力更好一样。

这些概念——真理、知识、权利、健康——都不是完全明晰的概念。有一种学说认为,存在着一个叫做真理的东西而且对它的追求具有其内在的价值,然而在许多大学教师的心目中,这种学说开始与“形而上学”、“神学”、“唯心主义”、“教条”、“宗教”——简而言之,就是所有那些遭到了众多科学家和学者们反对的信念及思维模式——联系了起来。在当今世界上流行着一种经常被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表达出来的愿望,那就是企图贬低甚至消除那种认为真理可以被发现和传授的观点。否认客观的可能性,否认符合规范地和不带偏见地寻求知识的可能性,否认真正摆脱了发现者和传播者的

* 重印自 *Minerva* XX/1—2 (Spring—Summer, 1982): 107—208。

情感、愿望或“物质利益”的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所有这些否认都在今天真正有影响力的学术圈子里变得日益流行。一些大学教师日复一日地鼓吹这些否认。然而,他们的行为却总是违背他们的言论。他们仍然充分地相信理性证明的可能性,以便由此来证明他们所发表的言论是真实的结论,并且试图在他们所提出的论据以及证据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来说服他们的听众和读者去相信他们对于真理的可能性的否认是真实的。

对于任何真理的探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理必须被不断地重新探究。真理总是会被新的发现所改变,而所谓新的发现就是通过新的观察和分析来修正那些在过去曾经被视为正确的命题。正因如此,在对待当前所接受的任何真理的态度上,都应该包含着试图和准备做出修正的因素。准备做出修正并不等于相对主义。它并不意味着任何命题都与其他命题一样真实,也不意味着一个命题的真实性取决于其证明者或接受者的社会地位或政治立场。而是意味着,在任何时候,我们所认为的最佳命题都应该是通过那些得到科学界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可的观察方法和分析方法获得的。如果我们接受了符合这些标准的命题,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了这些特殊的命题不会被这样的方法证明是错误的,正如它们将会被其他那些依赖于更好的观察和解释的命题所修正和取代一样。

大学教师真正需要关心的事情是:他们在教学中提出的或者在研究中得出的陈述应该尽可能真实,应该立足于系统收集的 and 经过分析的证据,应该考虑到本专业领域的知识状况。这种关心构成了他们的职业特色。它也是正当的学术生活以及维系这种生活的社会机构(尤其是大学)得以存在的保证。大学教师所具有的所有那些更加具体的、与众不同的职责都根源于他们对于特殊真理和普遍真理的关心。如果疾病只是虚构的神话,那么就不需要医务人员,如果权利只是虚构的神话,那么就不需要律师。因此,如果真理、客观性和理性证明都只是虚构的神话,那么就不需要去进行教学和研究,也不需要去特别关注大学教师的那些更加具体的任务,例如参加教师聘任工作、提供专家建议之类的任务。

大学教师的所有工作都依赖于这个假设。可是当他们沉浸于自己的专业研究和教学活动之中时,或者当他们为了处理公共事务而分散精力时,这个事实却常常遭到他们的忽视。除非他们是专业的哲学家,否则他们就不会花时间去思考真理的本质及其与自己的工作之间的关系,正如医生不会整天去思考疾病的原因以及如何预防疾病一样。他们有专门的任务要完成,有专门的研究要进行,有专门的知识要传授;他们把这些任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他们不愿让自己去操心那些作为他们的专业工作之基础的基本原理。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迫切地提醒大学教师去注意他们在步入自己的学

术生涯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大学教师热切地希望参与那些有助于促进社会平等或社会正义的活动,希望迎合人们的要求并且满足自己参与社会实践的愿望,以至于他们有时候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至关重要的、与众不同的使命,那就是,在他们的一切研究和教学领域中维护真理,并且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尊重真理。这些额外的目的原本并不会妨碍他们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中系统地追求可靠的知识。但是,如果大学教师没有完成他们的基本工作,即没有尽可能小心谨慎地和有条不紊地在他们所负责的领域里发现和传授真理,那么他们将只能变成他们感到满意的某种社会制度的鼓吹者,或者变成一个特殊的有闲阶层,而这个阶层之所以能够得到社会的“供养”,仅仅是因为他们中的一部分成员,例如那些从事医学、法学、化学或工程学的教师,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教学和咨询来为社会提供有用的服务。

当然,在对于大学教师和学术机构的功能的看法上,还有另外两种我们不能忽视的观点。事实上,我们常常注意到它们会通过如下方式表达出来。第一种观点是说,大学的唯一目的就是训练学生去适应特殊职业的需要;第二种观点则是说,大学的功能就是成为革命性变化的中心。就关于大学使命的第一种观点而言,我们应该指出:尽管大学确实应该训练学生去有效地从事某些职业,但是并非一切形式的职业训练都适合于大学。只有那些依赖于某种基础知识而非主要强调实践技能的职业才适合在大学里进行训练。大学确实应该为那些需要掌握一系列的系統知识、能够评价证据并且愿意关注新形势的职业提供教育。大学教育的任务不是培养学生去从事那些例行公事的职业。它应该为那些需要掌握基本程序、原理和分析方法的职业提供教育。就那种认为大学应该成为革命行动的中心的观点而言,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大学常常是大千世界里的深刻变革的出发点或策源地。这些变革都是建立在某种思想基础之上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变革都根源于大学里的科学家和学者们的思想成果,例如,他们在经济学、社会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里的成果。然而,如果我们把大学视为政治宣传的中心,就等于让它们去承担一种适合于政治党派而不是适合于大学的责任。事实上,那种让学生和教师为了某个特定的政治立场而联合起来并且对外部世界施加影响的建议是荒谬可笑的,甚至还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只应该共同致力于两个目标:知识上的完备和研究上的自由。但是这种要求在本质上并不是什么政治纲领,尽管它带有政治性的含意。

进行调查研究并且传授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成果是大学知道如何做并且能够做好的事情。把它们视为大学的功能并不是武断的,正如把治病视为医生的职责并不是武断的一样。有一些医生会把赚钱、提升社会地位或者维持医疗垄断看得比治病更加重要。但他们是糟糕的医生。因此,那些不把真理探

究和教学放在第一位的大学教师也是糟糕的教师。

大学教师的职业之所以要在这里受到特别的关注,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学术职业的状况更加糟糕。我们之所以要讨论大学教师的道德问题和责任,并不是因为这个职业曾经是完美的并且在后来出现了危险的堕落,而是因为大学教师所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所以需要重新界定他们的道德责任,以便使他们适应新的任务。没有任何职业能够免除基本的道德责任;任何职业都会经常遭遇那些导致其道德责任受到冷嘲热讽或者无端忽视的形势,尤其是当它把注意力放在某些次要的但又完全合理的目标之上时。在贯穿于整个大学历史的学术生活中,总是会不断地出现这样的形势。当前的大学所面临的也是这样一种形势,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又是独一无二的。在过去的三分之一世纪里,大学开始面临新的环境和新的要求。世界变得更加繁忙,而且更多的事情似乎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对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因为他们周围的空气中充满了各种被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所夸大的战争和战争流言。参与各种非学术活动的新机会也开始出现。

学生的人数大幅增长,大学变得越来越庞大,而且教师人数也大大扩充了。许多新的大学建立了。对于大学的要求增加了。大学教师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他们周围的社会问题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况相比,处在自由民主社会中的大学变得更加依赖政府并且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影响。对于大学的要求越多,它们所消耗的成本也就越高。大学比过去受到了更多的公众监督,而且许多行政人员和教师开始为自己和自己的大学寻求公众的注意。现在,大学里的行政人员要远远多于以往。大学已经变得比过去更加分崩离析。

过去的十年是财政环境较为紧张的时期,年轻一代科学家和学者们的求职机会减少了,而大学与政府、私营企业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则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个长达十年的财政紧缩的时期之前,是历时四分之一世纪的大扩张和狂热的乐观主义的时期。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中出现的混乱状况使他们明显地忽视了学术生活中的某些核心任务。当然,有许多教师仍然在履行他们的职责,还有大量的教师仍然在无私地献身于科学研究。但是在最近几十年来,坚定的道德感已经被削弱了,而且大学教师在献身于其使命时的自信心也被动摇了。因此,我们有必要为这个职业澄清它自身的思想,并且要重新确定它所承担的基本责任。

这份报告旨在促进那些关于大学教师 and 学术机构的正当目的的讨论。除了在几场断断续续的讨论中对个别的弊端和滥用做出了初步的回应之外,大学教师几乎没有公布什么指导性原则来规定他们在教学和研究中的知识管理权,以及他们在大学内部管理中的角色及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这样的原则应该非常宽泛,能涵盖大学教师在专心获取和传授更高层次的复杂知识时所

涉及的各个主要活动领域。这些原则应该适用于大学教师所参与的一切活动——它们不仅应该包括他们在科学上、学术上、教育上的活动以及在参与大学内部管理时的活动,而且应该包括他们的公共性和政治性的活动以及他们为政府机构、私营企业、政治和民间团体提供建议和咨询服务的活动。

大学教师的职责是多方面的,就像他的^①角色一样。尽管教师的角色是重要的,但是大学教师并不仅仅是教师。对于一位在现代大学里任教的教师而言,教学仅仅是其工作的一部分。人们期望大学教师应该做一些研究;研究被视为与教学同等重要的职责,尽管两者的重点及其所占的比重是有所不同。当然,并非所有的教师都要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分配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兴趣——有些教师将主要进行教学,并且进行相对较少的研究;还有些教师则要比其他教师进行更多的研究。也并非所有的大学都具有同样的模式——有些大学更加注重研究而非教学;有些大学则更加注重教学而非其他事情。在不太重视研究的大学里,那些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的教师同样有责任去进行一些研究,因为他们需要进行一些服务于教学的最重要的研究。此外,大学教师还是学术机构的成员,而后者不仅仅是一个为他的教学和科研提供后勤保障的机构;他不仅是一所大学里的某一个系的成员,而且是这所大学里的一名教育工作者。他也是科学界、学术界以及知识界中的一员,而这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本人所在的系、大学、职业和国家的界限。他还是他自己所在的那个社会里的公民,而且他要比其他的普通公民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责,因为他比他们拥有更加广博的、更为详尽的、确凿可靠的知识储备。

大学教师的特殊职责根源于他所拥有的知识储备,而其他那些没有系统地专门地追求知识的人则不拥有这样的储备。人们相信,大学教师所拥有的知识可以被运用于他们所关心的重大实践问题,例如健康、经济、军事安全、工业生产等等,这种信念是大学教师受到尊重的原因之一。如果一个人掌握着关于重要问题的专门知识,他就会受到尊重,但是这种尊重并不是这位知识的拥有者所刻意追求的结果。他不必感谢那些尊重他的人。他所要做的就是不去滥用他们对自己的尊重。

丰富的知识本身对于其拥有者的行为并没有必然的含义,然而在某些方面,它却带有这样的含义。它首先意味着对于知识之真实性的关注。而这种含义正是我们所关心的东西。例如,关于城市化的各种不同后果的知识并不能决定任何特殊的行动进程。它只是留下了一个问题,即这些后果为什么会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并且可能引起个别人的反对。但是当一名大学教师把

① 在本书的任何地方,“他”或“他的”都是用来指称单个的大学教师,所以既可以将其理解成男性,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女性。

一种关于这些后果的论断作为知识提出来时,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确保它们的确是真正的后果。简而言之,对于知识的拥有和传播意味着对于寻求知识的规则或方法的尊重,它要求大学教师必须承认并且严格恪守那些在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实行的关于真实性的标准。反过来,这又决定了他在有疑问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建议时的谦逊态度。而且这还进一步暗示了他向学生、公众或者社会的管理者传播知识的方式。

学术道德就是所有这些责任的总和,它不仅涉及对于高深知识的追求和传播,而且还涉及对于这种知识的真正拥有或者假定拥有所导致的角色和行为。学术道德是真实存在的。它并不是在大学之外构想出来并且作为一种选择而提供给大学的东西。它得到了大多数大学教师的支持,尤其是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这份报告的目的就是更加清楚地说明它,阐释它的某些含意,并且帮助同事们去思考大学教师在生活与工作中的道德要求。最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社会发生的情况使这种道德责任遭到了削弱。这种削弱当然不应该被夸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的形势并非没有其令人忧虑的方面。

拥有了高级、复杂、可靠的知识,也就拥有了责任

在 20 世纪,在大学任教已经不再被仅仅视为一种谋生的职业。当它被称为“专业”(profession)的时候,这个称呼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表明了它不同于其他那些由市场变化或者政府的行政能力来操纵其命运的职业。它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能够给从业者带来特权和特殊的义务的职业。虽然近几十年来,人们试图将许多职业称为“专业”(profession),但是真正的专业仍然像人们在许多世纪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只有依靠数量惊人的复杂知识才能从事的职业,而且这种知识还必须通过长期的系统研究和经过权威的认证才能获得。从根本上看,律师、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确实都属于这样的职业。前三种职业所从事的工作是把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即运用于特殊的形势和对象之上。在人类通过系统的研究而获得的全部知识之中,它们所能运用的知识只是相对有限的一部分。然而,尽管大学教师内部也存在劳动分工,但是他们的职业却涵盖了一切来自于系统研究的、通过方法获得的知识,其中包括那些可以运用于法学、医学和工程学的知识。

大学教师的基本任务就是获取并传播知识,而不是运用知识。大学教师要通过系统的研究来接受、吸收和发现知识,并且要解释和传播它们;大学教师要传播发现知识的方法,而且尤其要传播审核知识的方法。即使一名大学教师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把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他也不会将自己所传播的知识亲自运用于实践活动。例如,当他传授一门技术的时候,他是在传授一种关于知识的运用的知识。他所传授的内容是如何把关于一种特殊事物的知识

运用于特殊的实践任务之中。他本人并没有运用他所传授的技术知识。一名大学教师在讲授工程学的时候是不会从事工程师的实践活动的。在大学里,临床医学、法律程序、建筑设计、工程建设等方面的运用原理和技术也可能成为教学的内容,但这样的教学同样是在传授知识,它们是在传授有关这些运用的规则和方法的知识。在大学里,有很多教学完全与实际用途无关,它们所传授的是关于个别现象或者某些类型的现象的知识。它们试图消除错误、困惑和误解。

在现代大学里,教学要与研究相结合,至少要努力跟上最新的研究进展。大学教师不仅要进行研究,而且要把他的教学建立在别人的及他自己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研究本身就是通过方法来获取迄今尚不为人所知的知识。知识如果得不到研究的培育,就会凋谢和枯萎。教学如果得不到研究的支持,也会丧失活力。虽然有个别的教师只需进行相对较少的研究,但他们却必须了解本学科的研究状况。知识并不是自给自足的,它不会自行增长。只有积极地追求知识并且将知识运用于教学之中,才能使教学保持活力。这些都是大学教师最重要的责任。

尽管各种学术性职业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不同之处,但它们仍然具有一个很大的相似之处。任何一种学术性职业都需要掌握大量、复杂的高级知识,而它所服务的普通顾客、病人和学生则缺少这样的知识储备。在知识拥有上的这种不平等为知识的拥有者们提供了很多滥用其优势地位的机会。

与普通人相比,大学教师拥有更加精妙复杂的知识,也就是说,这些知识在数量上更多,需要经受更基本和更严格的评价和检验,大学教师因而要承担特殊的职责。大学教师所拥有的知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不同于普通人所拥有的知识,这是政府机构和私人团体邀请他们去提供“专家”建议的原因。人们普遍认为,大学教师不仅拥有专门的研究成果,而且拥有客观地思考问题的习惯,拥有客观公正、不带感情的学理化判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大学教师的这种声望在今天正面临着遭到怀疑的风险。

大学教师享有各种特权,包括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在聘任和晋升、教学方法、课程设置、考试的安排和实施等方面所享有的相当大的自主权——以及科学研究的自由、出版发表的自由等等。从根本上看,所有这些特权的依据都在于:他们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比学生和普通人拥有更多的知识。大学的法人自治权(corporate autonomy)也依赖于某些法律传统,后者仍然是这种曾经被同业公会、社会阶层以及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形成的各种团体所享受过的法人自治权的原则之一。实行大学自治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为了维护传统和保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而是因为大学教师所传授和发现的各种知识的正确性只有通过这些在长期的深入研究中掌握了它们的人才能得到检验。